

陳布雷書生報國

王覺源

疾風勁草實行屍諫

中國歷史上，每當世衰道微，國祚岌岌之際，總不免有些成仁取義、捨身報主、盡忠國家的士人。唐太宗的名言：「疾風知勁草，板蕩識忠臣。」就是太宗在罷黜權萬紀以後，賜給太子少師蕭瑀的詩。而此類忠貞不貳之臣，多屬文人士大夫階級，而且代有其人，流光史冊。

自由中國政府對日抗戰勝利之後，播遷來臺前，正當中共竊國叛亂、危急存亡之秋，感孤城落日，憂憤滿腔，表忠貞而自殺殉國者，在我記憶之中，先後便有臺灣大學教授喬大莊，捨身沉於蘇州護城河；監察委員虞琛菴，附輪投海自溺；正中書局總經理蔣志澄亦愛國自殺見志之一人。其未見於新聞傳播者，尚不知有多少？尤其聲望重海內，轟動一時之自殺殉國者，更有陳布雷與戴季陶兩先生。

此二公者，皆當國脈絕續之交，對當局實行呈屍諍諫，更冀激發國人奮起、共挽狂瀾，此皆古所謂讀書明理的士大夫。而且陳布雷與戴季陶早年（民國元年）同為上海天鐸報秉筆政的健將

，晚年同負清譽的黨國要人，世人觀感自更不同。輕生自殺原不足以為訓，但千古艱難為一死，而自發自動，輕生以求解脫者，究竟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。上述諸公，雖同歸一途，而我現在所欲述者，祇限於陳布雷先生一人而已，不及其他。

書生本色領袖股肱

陳布雷，原名順恩，字彥及，寫文章的筆名常用「彥」字，一字畏壘。當其肄業於浙江高等學堂時，同學們以其面頰圓滿，戲予以渾號，曰「麵包孩兒」。麵包英文為BREAD，與「布雷」二字之中文譯音相同。有人問陳氏取名「布雷」的用意。陳以「布鼓雷門」之義答之。實則「布雷」者，其原始意義，乃中西合璧之麵包也。陳氏曾偶與知友談及，輒輒然自笑不已，自後乃以「布雷」行。

陳布雷浙江慈谿人，生於清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。十五歲應寧波院試中秀才。二十二歲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後，赴滬從事新聞工作。

新聞乃當時的熱門行業，他與李懷霜、戴季陶、洪佛矢（均天鐸報）、宋教仁（民主報）、高劍文、柳亞子（南社）皆交往甚深。

陳布雷於民國元年入天鐸報。民國十年前後，入上海商報，繼任時事新報總主筆，與程滄波（中行）、趙尊嶽（叔雅）等皆志同道合，相知彌深。

自民國元年至國民革命北伐成功，陳布雷從事文化新聞事業，垂十六、七年，始以書生本色轉入政途，歷任中樞黨政要職；並被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羅致幕中，位置侍從，掌管機要，成為領袖的股肱，所有重要文獻，十九皆出其手。文名廣播，天下爭誦。

剛正立身語服四座

陳布雷活躍於政壇，時黨、時政、時文教，所居皆顯位重職。對日抗戰勝利，國府遷都南京以後，他身任國民黨中央委員、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長、國民政府委員、總統府國策顧問，主持戡亂宣傳小組，當選國民大會代表，參與制憲行憲大業。隨分報國，從無越權出軌之行。時領袖

侍從室已經撤銷，他仍輔佐領袖，司筆墨、備諮詢，直至其自殺殉國始終為領袖蔣公的文學侍從。

中國自古以來的士大夫，多祇想做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以上」的宰相。及到了位極人臣的地位，便常不免驕妄自大，野心勃勃，或結黨營私，弄權竊柄。若陳布雷者，則毫無此類心跡形象。他一生謹言慎行，剛正忠純，不但深為總裁蔣公所信賴，亦朝野人士所推崇悅服的典型。有一次

「中央黨政軍聯席會報」開會，討論到黨派與學潮的問題，首由主席吳鐵城報告後，次由張厲生發言，大發高論，頭頭是道，也很近情合理，頗得與會諸公的同情；繼起多人發言，都不外補充張厲生之意見而已。隨後，陳布雷起立，尚未發言，即彷彿有一股剛正之氣凌人，全場屏息靜氣，鴉雀無聲；他很輕言細語的，祇說了幾句話，張厲生便馬上站起來申明放棄剛才所發表的意見主張，同時亦再無繼起申言者。主席便根據陳布雷的意見，作了結論。

民國三十七年，國民大會籌備召開之前，國民黨中央常會，審查提名本黨總統候選人時，原有正反兩種意見，一時相持難下。陳布雷突起發言：「蔣總裁非不願出任總統，只因憲法之規定總統的權限太小，不足以應戡亂建國時期的特殊需要，所以他才有捨總統而就行政院的意向。現在正徵得國大代表莫德惠的同意，由他向國大會議提出，在憲法加入一個臨時條款，付與總統以某些必須的特權，如此，蔣總裁就會願意擔任總統了。」

接着陳布雷又從衣袋中取出一張紙條宣讀（自然是先寫就的），大意是：「總裁既堅決表示不願作總統，國民黨中央亦不能另提候選人，只得聽由國大代表自行決定。希望總裁仍本救國救民的初衷，出任總統，以慰萬民嗚呼之望。」陳布雷一經宣讀畢，大家信服，自無異議。第二天，中央全會也就照案通過了。

由這兩次重要會議的情形看來，足見陳布雷之為朝野人士所推重信賴，實無可疑。

苦悶悲傷以致厭世

民國三十七年，由於蘇俄侵略、中共叛國，雙層壓力臨頭，以致國事日非。陳布雷怵目驚心，疑慮憂懼，內心的抑鬱、苦悶、悲傷，莫能自解；加以原本體力衰弱，至此病態益顯。說到陳氏的健康情形，我記得左舜生（青年黨領袖之一，時任農林部長）曾告訴我：「我在他自殺之前，曾和他同車由上海回南京。我看到他精神萎頓，因問他近來身體如何？他答以：『我這個身體，好比一部機器，實已用到不能再用了。從前偶然修理修理，也還照常可以開動。現在確已到了修理也無法修理的時候了。』他說時無限慨然，似乎已存有解脫之念。他原來貌很清癯，即因體弱多病，有時必須藉安眠藥片，始能入睡。終身與文字結緣，生活又相當清苦，他真是中國古老讀書人的造像。」他的精神體力到了這種地步，便深深覺得報國無從，內心自然抑鬱、苦悶、悲傷到了極點，而找不着出路。

人類有一種懷疑精神，這種懷疑精神，發之

於知識學術方面，則成了人類文明進步的原動力；懷疑繼而擴大及於宗教、道德、法律、人生，乃至一切生活，而無一不懷疑之境，這必然的結果，則信仰破壞，一切信仰無不動搖。信仰不立，則內心的不安日甚一日，便不自覺的抑鬱難伸。抑鬱不伸，便不自覺的釀成苦悶。愈苦悶愈懷疑，愈懷疑愈苦悶；二者凝結為一團，內心即為懷疑與苦悶糾結所統攝，更覺惴惴不安。目察前途，便無一不呈暗淡悲觀的色彩，看不到半點光明，自然便會趨於厭世之途，早求解脫，一了百了，苦悶、悲傷到了厭世之境，樂觀、希望完全斷送，於是什麼生趣、什麼活力也喪盡滅絕了。陳布雷身體既不健康，精神又到如是苦悶、悲傷的境地，無法自拔，便祇有早求解脫一途。如不自求解脫，勢必瘋狂，成為「瘋人院」裏的常客。陳布雷果選擇了自求解脫之途，乃於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私服多量安眠藥片自殺以殉，時年五十九歲。以現代標準言，正是人生大有為的階段。

遺書兩封言婉而誠

陳布雷之自殺身殉，世人哀之，同聲惋歎。他之所以厭世輕生，一方面是感於國勢危如累卵，政治、經濟、軍事以及士氣民心，到了三十七年冬已經愈趨愈下，自己又無能為力挽救垂危。一方面則基於上節所述的心理因素，死結糾纏，無法解開，尤其對於領袖蔣公特達之知，仍時懷感恩圖報之心，亦已心餘力絀。僅餘的一條路，就是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，採取古大臣忠貞

不貳之舉，「一死謝君王」。自殺之前，並親寫遺書兩封，留呈領袖蔣公。遺書載於是年十一月某日上海報章。書云：

「布雷追隨鈞座二十年，受知深切，任何痛苦均應承當，以期無負教誨。但今春以來，目睹耳聞，飽受刺激。入夏秋後，病象日增，神經極度衰弱，實已不堪勉強支持。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，而自驗近來身心，已無絲毫可以致命之能力。與其偷生屍位，使公誤計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的部下，因而遺誤公務，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，而結束其毫無價值之一生。凡此狂愚之思想，純屬心理之失常！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，深感此舉為萬無諒恕之罪惡，實無面目再求有諒。縱有百功，亦不可能掩此一眚。況自問平生，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！天佑中國，必能轉危為安。惟公善保政躬，頤養天和，以保三民主義之成功，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。回憶許身麾下，早置生死於度外，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，而陷此極不負責之結局。書生無用，負國負公，真不知何詞以自解也。」

另一封遺書云：

「介公再鑒：當此前方捷報頻傳，後方秩序漸穩之時，而布雷乃忽得狂疾，以至於不起，不能分公憂勞，反貽公以刺激，實萬萬無詞，以自解。然布雷此意，早動於數年之前（當時，亦因身體太不爭氣，工作未如預期，而自責自譴，無顏偷生）。而最近亦起於七、八月之間。常誦『瓶之罄兮，惟壘之恥』之句，抑抑

不可終日。黨國艱危至此，賤軀乃久久不能自振，年迫衰暮，無補危時。韓愈有言：『中朝大官老於事，詎知感激徒煇炯。』布雷自問良知，實覺此時不應無感激輕生之士，而此身已非自效危艱之身，長日迴皇，慚憤無地。昔者公聞葉舉誣誣總理之言，而置箸不食。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『老百姓』中毒素宣傳，以散播關於公之誣毀者，不知凡幾。回憶三十二年在滬時，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，而四、五年來，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，即此一端，已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。我心純潔質直，除忠於我公之外，無一毫其他私念。今乃以無地自容之悔改，出如此無可諒恕之結局，實出於心理狂鬱之萬不得已，敢再為公陳之。」

陳氏這兩封遺書，均記「寫於十一月十二日」。明知輕生自殺，乃弱者之行為，萬無為領袖諒恕之罪惡，悔改毫未盡力以收柔榆之功，引「瓶之罄兮，惟壘之恥」以自喻。披肝瀝膽，具見忠誠，言詞委婉，懇切動人。寓自責於諫勸，實是兩篇好文章，非僅氣勢剛正而已。今雖事隔三十餘年，不以專廢言，吾人讀其文，想見其人，猶莫不深具同情之感。

生性忠純自律嚴謹

陳布雷身材短小瘦削，有弱不禁風的形象。相者謂其為木型人物，非富即貴，貴實富虛，陳氏指為無稽之談。生卒不太修邊幅，亦不喜隨俗浮沉。自入學至服務社會，始終維持書生本

色。及其老也，立於廟堂之上，仍是恂恂儒者，而沒有富貴之氣。行動穩重，雖單薄而不輕浮；輕詞細語，從無疾言厲色。雖參與軍國大計二十餘年，但能明辨是非，洞悉利害。且自律嚴謹，與世無爭，自更無營私貪瀆之行，實古賢臣良相一流的人物。

左舜生於陳布雷去世後，述其行誼有云：「布雷為一極端謹慎之人，不矜誇、不浮陳，惟內心有不可逾越的尺度；其人格亦有不可或犯之尊嚴；然待人接物，則一以書生本色出之，既無所謂『冷冰冰』，亦無所謂『熱烘烘』。蓋歷二十餘年，余實未見其一改常態也。」諸葛武侯志慮忠純，一生唯謹慎，陳氏一生，既已有之，但不料竟實踐了武侯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的道路。

陳氏平日生活，極為簡樸，既無大馬聲色之好，亦無執袴奢靡之習。最大嗜好，惟愛吸茄力克香烟，飲杭州龍井茶，福建「鼎日有」的肉鬆。此三者，抗戰以前和戰後，在京滬一帶，取之極為方便。戰時在重慶，則為不易多得之物。幸賴有上海閩人杜月笙設法搜求以應之。至有謂陳氏工作至深夜時，一如張季鸞所嗜，藉福壽膏（鴉片）以振奮精神者，實不足採信。

為言爽直記者風範

陳布雷雖是小心謹慎之人，在言論方面，為求於事有益，晚年猶不失其記者風範。爽率率直，實情實報。對日抗戰發生，他隨國府西遷至重慶。三十年十二月八日，太平洋事變突發，美國對

日本作戰，我士氣民心大為振奮。時某公和陳氏通電話，談到太平洋事件時，竟高叫出「中華民國萬歲」的口號來。陳氏却愛心忡忡的說：「且慢高興，問題正多着呢！」這不但能見其智慮已深入一層，其爽直氣概，亦不自覺的流露於言表。

陳氏至重慶約月餘，寓上清寺陶園之農村。雖少與一般人士交往，但與四川軍政界及文教新聞界則接觸頻繁。對人對事，無不觀察入微。據他批評四川人說：「川人穎慧活潑，實甚於他省，而沉着質樸之士殊不多觀。模仿性極強，亦頗思上進；然多疑善變。凡事不能從根本致力，即軍人官吏亦均文勝於質，老大而氣狹。」故陳氏亦是一個正義感極強的人，感覺亦極敏銳，蒞川不過一月，便洞悉多方。身雖居高官顯職，仍無時忘其新聞記者的風格，因常不免流露其月旦人物，嚴肅報導的老脾氣。

他不但未拋掉新聞記者的老脾氣，尤未忘情記者生活。抗日戰爭勝利以後，他不但有傲履尊榮、功成身退的思想，也實際計劃過，擺脫政治生涯，重操新聞舊業，以終其身的打算；無奈此時他已有騎虎難下之勢，輕言棄政，殆為不可能之事。所以後來他對程滄波於三十六年，能辭掉江蘇監察使，去上海接任新聞報社長之事，欣羨不已。當由南京馳書上海道賀說：「君今真為獨立與自由之記者矣！」由這「真」字觀之，他把記者生涯，直視為無限自由幸福之事。

責有微言無傷賢者

陳布雷自殺身殉，舉世哀之。惟因禍亂日急，干戈擾攘之際，朝野上下各有所務，對於陳氏身後哀榮之典，便未遑極盡其禮。不過見於報端，各方為詩聯以悼輓之者，頗不乏人。程滄波有聯云：「血淚伴忠魂，江山無恙；死生關大計，社稷有靈。」程氏與陳氏為三十年文字之交，且同為新聞界之健者，聯語雖泛泛其言，實則含蓄深意寓於其中。

上海某報刊出陳氏的遺書後，並附以七絕詩云：「能忠明主亦奇賢，讀罷潛然復黯然；今日民間諸般苦，嗟君臨死一無言。」很明顯的，對陳氏遺言略有微詞，其實亦苛求太甚。臨終之言，那能與平日上萬言書可比！倘設身處地想想：陳氏生前如未盡其言責，那屍諫又為什麼？要求什麼？誠能憬悟及此，那不情之論，自不足為賢者病。

忠貞愛國值得敬仰

難道世專真是無獨有偶嗎？陳布雷自殺身殉之後，相距不過三個月，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，與陳氏同年誕生，民元同為上海天鐸報主筆，同時代的名記者，晚年同為聲望貫全國的戴季陶亦以自殺身殉聞。

戴季陶名傳賢，筆名天仇，晚號孝園。先世由安徽遷浙江，再遷四川，落川籍。清末入同盟會，參加革命，受知於國父孫先生，與先總統蔣公介石為金蘭之交。歷膺黨國重任，居考試院院長多年。晚年震饋禮經之作，禮佛誦經，更耽禪悅。戴氏之自殺以殉，或係受了陳布雷的影響和

刺激；或對當前國運，孤城落日，崩潰堪虞，與陳氏亦具同見同感。其輕生方式，更與陳氏相同，穿上整齊的中國禮服，藍袍馬褂，吞服安眠藥七十餘片，以求「解脫」，自殺於廣州東山招待所。

戴氏臨終遺言：「靈柩歸葬四川。」四月，靈柩抵川，以國葬之禮，埋骨成都。惟其遺言則始終未見公開發表於世。現黨史委員會或國史館不知有否保存着？因為戴氏係蔣公公直諫之友，對於介公素極推崇信仰；他在介公之前，更素以直言敢諫稱著。今因何自殺以殉？必有心腑誠悃之言，以報介公。

「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」自是必然的。但其內容如何？早有人揣測，必較陳氏遺言更為剴切率真；或有未可公開洩露的秘密，至今仍屬一個謎。吾人且不必去探究。

無論如何，在徐（州）蚌（埠）戰後，平津淪陷，中央最後派遣張治中、邵力子、黃紹竑等北上議和，投降不返，竟不聞有人作北地王之哭。祇有陳布雷、戴季陶等幾位書生，不忍見麋鹿之遊金陵鳳凰臺，而先後以死督諫，故戴、陳諸氏，總算是忠貞愛國值得世人敬仰的。

訂閱「時代文摘」，「中外雜誌」請撥電話五三六四二〇六。